

文章编号:2095-0365(2011)03-0061-05

“桃梨之争”:翻译观差异与意气之争

耿宝强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3)

摘 要:朱湘、饶孟侃与王宗璠的“桃梨之争”,是翻译中“原作中心论”与“读者中心论”的交锋,给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同时,“桃梨之争”显现了长期被遗弃、被歧视、被认作低人一等,而又渴望被承认的朱湘对时代与社会的抗争、背离和仇视。

关键词:桃梨之争;翻译观;意气;朱湘;饶孟侃;王宗璠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一、“桃李之争”的来龙去脉

1925年2月25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62期用一整版发表了学者王宗璠与该刊编辑王剑三(即王统照)谈译诗的“通讯”。在信中,王宗璠谈了自己的译诗体会,赞扬了徐志摩的译诗才能,在“又及”中顺带提及了朱湘翻译的《异域乡思》:“假如我书架上的那本白朗宁的诗集没有多大的错误,那么,朱湘的翻译就大错特错了。”^[1]并具体指出了其中的第11行至14行的几处错误,最典型的是将原诗第11行的 Pear-tree(梨树)译成了“天桃”。王剑三在复信中谈及这个问题,语调要客气些,说译诗“的确没有把当前的情景及句子的构造分清,想是他一时的大意。”^[2]

“清华四子”之一的饶孟侃一见“通讯”,便出马为朋友辩护,写了《“春风吹又生”》,刊在3月8日的《晨报副刊》上。他套用对方的话说:“假如我书架上的这本白朗宁的诗集没有多大错误,那么我敢郑重地声明朱君的翻译没有大错误或‘大错’。”^{[3]155}对于梨子怎么变成了桃子,饶孟侃说:“不错,朱君果然是很大意的错了一点,但王君并没有指明究竟是错在一个字还是五个字全错,所以我也不敢断定我看的就是王君所看的错误。如果王君和我一样的看出了 Peach 为 Pear 之误,那么这一类不经意的错处,只要不损原诗的美,读者

当然可以原谅……译者不用‘盛开’而用‘烂漫’,不过是要求其译文较美罢了。”^{[3]157}

朱湘没有及时读到“通讯”,郑振铎把信拿给他看了以后,他便也在三天后的《京报副刊》第85号上发表了一封致《文学旬刊》编辑的公开信《白朗宁的“异域乡思”与英诗》。在信中,他首先表示“指摘我的《异域乡思》的中译的文章,我看了它以后,觉得指摘之处很可商量,特上此函,详加讨论”。然后他表明自己并非误译,“第一句的梨树我将它改作桃花,因为想与第三句协韵”。^{[4]279}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出了王宗璠发表在《文学旬刊》上的译诗《生命的雕像》的错误,并示以自己认为正确的译法。

对朱湘的解释,王宗璠在3月15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读了〈白朗宁的“异域乡思”与英诗〉后》从两方面进行了回应。针对翻译中为了取得“美”的效果而改动原文的现象,他说:

一个原文不美改了,两个三个……原文不美也不要改嘛!“翻译”旁人的文字,只顾自己的修辞“美”,而不问原文的“真”,这怎么能称为“翻译的艺术”!假如有一人也会做英文诗,因为音韵效果关系,把中国的诗句如“夕阳反照桃花坞”及“一庭银海浸梨花”里的桃花译成梨花,梨花译作桃花,这样子如果朱先生看见了,能默尔而息不说

这是错误吗?^[5]

就“天桃”与“梨花”两个意象的联想义,他认为,“白朗宁的想象中本是玉骨冰魂的淡素的梨花,如今朱先生硬叫他的想象里布满了鲜艳灿烂的妖冶的桃花”,算得上是一种“偏谬”。他还沿用了哥伦比亚大学 Baker 教授就这首诗的一段注释:“就颜色效应……在他心里去追寻这诗的情景”,说由此可见“颜色是非常重要的。梨花是白的,桃花是红的,‘红’和‘白’颜色是一般么?颜色既错了,则和白朗宁的心田里的诗的情景也自大异”。^[5]

对饶孟侃的辩解,王宗璠写了还击文章《被春风冻僵了》。他说,对 Blossomed pear-tree 的翻译,饶先生既然承认“朱君果然是很大意地错了一点”,那么他的话也就是完全通过了,若要替朋友争面子,那就非先说这句译诗是“完全没有错”,才能立得住脚。^[6]

双方各抒己见之时,一位名叫乔乃作的大学生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盲目的读者》,批评朱湘的译诗。他说:“《异域乡思》的原文,我固然没有看过,而朱先生的译文和王先生的批评,也都没有读过”,但在只读了饶孟侃的辩护文字后,他觉得饶孟侃不该这样为朋友辩护,并断言:朱湘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译,乃是“虚浮好名”所致。^[6]

被年轻人这样指责,朱湘愤怒了。自己的朋友这样被年轻人指责,饶孟侃愤怒了。于是,3月28日的《京报副刊》102号上,同时刊发了朱湘的《一封致友人饶孟侃的公开信》(以下简称《致友人》)和饶孟侃的《附志》以及《“野火烧不尽”——告《盲目的读者》》(以下简称《“野火烧不尽”》)。

在《致友人》中,朱湘再次强调 Peach 并不是 Pear 之误,而仅仅是为了押韵的需要,并说“连你也当是我错了,幸亏我有拙作英译的旁证,不然,我简直要蒙不白之冤”。^{[7]287}

这样,饶孟侃只得在《附志》中先认错:“我要对我的朋友朱湘和读者申明:我说 Peach 为 Pear 之误,是根据王君通信中的节录朱译原文……才勉强下此判语的;因为王先生通信中所录的实绝无‘韵脚’可言,——我是太无‘猜今’、‘疑古’的态度才弄坏了事,我希望以后多交几个考据家做朋友,下次才不上当。”^[8]

也许正是“上当”后的懊恼,《“野火烧不尽”》写得相当刻薄,开头便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禽兽所以不如人就是因为它们只有冲动和直觉,没

有理智和思想;换句话说,禽兽只有私欲,所以它们可以什么都不必顾虑……”^[9]

不过,饶孟侃文中也颇有见地:“真正的批评家是一个思想清楚,富有系统及理会力的学者。他能指摘作者极难觉察的谬误或弱点,同时亦能了解作者真正的好处究在何处,并把它细细地分析出来。此外若是少了尊严的成分,他的批评仍是减色。”^[9]

二、“桃李之争”昭示的翻译观差异

论争双方都是20岁出头的青年,言辞不免激烈,何况,直言不讳也正是那个年代论辩的一大特色。不过,从今天的“译学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发生在上个世纪早期的这场关于诗歌翻译的争论,就会发现两种意见背后的思想差异。

《异域乡思》(Home Thoughts, From Abroad)是英国诗人罗伯特·白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客居意大利时写下的一首短诗。比较原文、朱湘的翻译和他们的辩驳,可以看出,王宗璠依据的是“原作中心论”,也就是在译文与原文间,侧重于原文,强调翻译应以忠实于原文为要旨,亦即在原文与译文间寻求对等。也就是说,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读者的接受问题,而是对原文信息处理的充分性,也就是对原文的忠信问题,这样势必就会出现德国哲学家兼翻译理论家施莱尔玛赫(Schleiermacher)所说的“让读者接近译文”的现象。

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原作中心论”不无道理。当时文学革命兴起不久,白话新诗创作刚刚起步,翻译诗歌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并对新的诗学体系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这样翻译与创作的界线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彼此间趋于模糊,加之最优秀的译作又多出自诗人的笔下,于是翻译文学成为了革新力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突破本国文学形式的藩篱,选择打破本国传统文学规范,使译文在充分性上更接近于原文,便于将那些本国不具备的新的模式带进来,以替代那些固有的、陈腐的模式。而在这些鲜活的外来因子中,自然包含有崭新的诗歌语言和文化意象。因此,在王宗璠看来,不论原文使用了何种意象,都得忠实地翻译出来。如果对原文做出了某种改动,那就是对原文的“误译”!

但这种策略,也有弊端。在给王剑三的信中,

王宗璠就谈到了自己试译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短诗《海滨》(Evening on Calais Beach)时所遇到的尴尬:看起来像对于音和意,还能兼顾;但比诗味隽永的原作,倒差有不可思议的距离!虽然他也知道,想让译诗能具有原作一样或超过原作的“美”,的确是难事!

从“原作中心论”出发,朱湘的译诗的确处理得不够恰当。对于这样一首无论是用词还是意韵都很简约的诗歌,朱湘改变了原诗意象,且所用意象又与原诗差距如此之大,这中间除了协韵的因素外,是否还存在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理解发生了偏差?或纯粹是出于误读?因为英文中 Pear(梨)与 Peach(桃)确实十分相似。

仅从朱湘对源语的驾驭程度来看,在清华学校时他的“英文永远是超上等,没有中等过”,^{[4]285}故而对原诗这样简单的用词,在语言理解上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应该排除,而且他在《白朗宁的“异域乡思”与英诗》中也否认由于“Pear 与 Peach 字形很像”导致误译的可能,并提到自己当年将旧作《春·乐人的》(The Musician's Spring)译成英文时同样采用了改变原诗意象的做法,将其中的“桃花”一词译成了 Peach。他同时还引了新近作的诗句:“在柳荫中偕了桃花,/同流往不可知的去处”。这些均表明他是刻意而为之。事实上,为了照顾读者,朱湘采用了“读者中心论”,着眼于译文在接受性,从而出现了像施莱尔玛赫所说的“让译文接近读者”的现象。这种接近于主体诗学规范的翻译策略牺牲了原文的意象,自然会引来非议。

朱湘所处的时代,正值新文学的萌芽期,翻译文学进入新文学领域,并逐渐占据了中心位置,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然而朱湘认为,“中国人对于诗是盲目的,尤其是对于英国诗,现代诗中最荣耀与古代希腊的诗前后照耀的,是盲目的”。^{[4]280}

尽管朱湘说的有点言过其实,但至少反映了当时的读者对于外国诗歌的认识。于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迁就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规范,朱湘像中国早期众多诗歌翻译家一样,刻意采用其熟悉的语言、结构甚至内容来改写原文,从而不可避免地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原文。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遵循了“读者中心论”,朱湘才在翻译时替换原诗意象。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这样做正好避免了王剑三在批评他的信中所说的:“不至于将原文的诗歌像单词记账般地移植到中文中来”。^[5]

“原作中心论”与“读者中心论”孰是孰非,见仁见智。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以目标文本(即译文)为中心的翻译观,逐渐成为了主流。这种翻译观,将翻译作为目标语文化系统中的既成事实加以考察,所有的翻译活动实质上是两种文化间的居中调停。这与朱湘遵循的“读者中心论”颇多相近。

三、“桃李之争”背后的意气之争

“桃梨之争”,是两种翻译观念的交锋。但不能就事论事,在《致友人》的公开信中,朱湘说,上次的那封信(按:即《白朗宁的“异域乡思”与英诗》),“不过是借了王先生一个鼓,来鼓出我这两年来的不平之鸣”。又说:“自从我加入社会潮流之后,我亲眼目睹的不平实在太多了,我的火气不由得时时冒上来。王先生的那一段好不公平的指摘,不过是一条引火线罢了”。他还把此信比作闻一多先生的《渔阳曲》(按:《渔阳曲》,原载1925年3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6卷第3号,是闻一多根据我国小说、戏曲中的传统题材弥衡击鼓骂曹改编而成的,以愤怒激昂闻名),其主旨不过是为了发泄几年来内心积蓄的忧愤和不平。^{[7]288}

与此同时,他还为许多被压抑的青年才俊无法被社会接纳而呜呼,可谓言辞激烈,痛快淋漓。他写道:

近人有一种习气,就是,一个有名的人所作的文章字字都是圣经,一个无名的人所作的文章字字都是恶札;这是一班贱人的必有的倾向,要勉强他们,也是不能的;但是这么大的中国,难道就没有三数个或一个眼光如炬的批评家发瑕扬微,推倒“名”的旗帜而竖起“真”的赤帜吗?^{[4]284}

在此,可以洞见他对于王宗璠大动干戈的内在隐秘。看来他是决意要做一个眼光如炬的批评家的,面对“名”的旗帜和社会的一切不公,他敢于挺身而出,并以激昂的言辞和姿态向社会宣告:“我是一个极端主张积极的人,但消极的事情逆了我的愿而来,临战而走,是谓懦夫,懦夫不是我的本质。我如今在这个地方,向一切不公平挑战。”“你们来吧!我在这里!”^{[4]283}朱湘确是一位敢于向一切不公平现象挑战的英雄,他针对的并非王宗璠。也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在朱湘《致友人》和饶孟侃《“野火烧不尽”》之后,王宗璠没有进一步反击!

朱湘“这两年来”遭受了一些他认为的不公。比如,因早点名经常不到、累计三次大过被清华学校开除;比如,新婚之时因为坚持只肯给大哥三鞠躬而与之决裂。这些是郁积,“桃梨之争”真正的导火索,是王宗璠在与王剑三的通信中,赞扬了徐志摩的译诗才能。饶孟侃就说,他急着出手,是因为不能忍受徐志摩受到那样的恭维,而朱湘受到如此的贬损。这体现着饶孟侃与朱湘的深厚情谊,也表露着他性情的孤傲、急躁。饶孟侃没有像清华学校其他学生一样留学美国,就与他的这种性情有关。1924年,在毕业前夕,因膳食不洁与一个外籍职员发生冲突,该职员竟以阻止留学要挟。个性率直的他一怒之下,自动放弃了留美名额,留在了北京。

朱湘对徐志摩的不满、反感与轻蔑,更是由来已久。在《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一文中,他称徐志摩为“梁启超的高足”,嘲笑他读别字、写别字,并说徐志摩是一个假诗人,不过凭借学阀的积势以及读众的浅陋在那里招摇。说徐志摩是“一个假诗人”,应该说毫无道理。诗有好坏之分,但诗人无所谓真假。写得出诗的人,叫诗人;写不出诗的人,不叫诗人。徐志摩写得出诗,甚至写得出好诗,他当然是诗人,如何“假”得了呢?显然,朱湘对徐志摩早有偏见。

偏见何来?首先,从生活作风上说,他很厌恶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一批新月文人的贵族生活作风。他曾在徐志摩家里吃过一回早点,单是水饺就有各式各样的花样。这样近于奢侈的生活,其实是很多人,特别是那些生活贫困却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所看不惯的。在朱湘等人厌恶“贵族气”的徐志摩的同时,梁实秋也很厌恶“以贫骄人”的文人,在《悼朱湘先生》中他说“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似的。价值观不同,朱湘又不能容忍,于是便直接将厌恶表现了出来。

其次,从对新诗人和新诗的看法上说,朱湘对

白话诗的首倡者和实践者胡适是相当不屑的。在《诗镌》创刊号的新诗评中,他就毫不留情面地对胡适进行了批评,直斥《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又说:“胡君的诗,没有一首不是平庸的”,甚至嘲笑胡适的主张是“浅薄可笑的”。^[10]对胡适的不屑,使他连带对与胡适关系甚密的徐志摩产生不满,对徐志摩的诗,自然也要批评。不过,在1926年1月的《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上,朱湘评论徐志摩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的《评徐君〈志摩的诗〉》,对徐志摩的诗,并非全盘否定,甚至在结尾处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徐君的第一本诗已经这样不凡,以后的更是可想而知,我们等着,心中充满了一腔希望地等候着罢。”^[11]到徐志摩的另一部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出版时,他竟然这样说:“那知道看下去,一首疲弱过一首,直到压轴一首《罪与罚》,我看了简直要呕出来。”^[12]¹⁶⁰末段更说,“徐君没有汪静之的灵感,没有郭鼎堂(按:即郭沫若)的奔放,没有闻家骅的幽玄,没有刘梦苇的清秀,徐君只有——借用徐君朋友批评徐君的话——浮浅。”^[12]¹⁶¹显然,这个时候,他的诗评已经脱离了正常的文艺批评的范畴,更多的渗杂了个人情绪,沦为宣泄个人好恶的工具了。

此时的朱湘,不愿被贱视,但社会还不能承认他价值的存在。而当他的渴望不能实现时,渴望就又转为抗争、背离和仇视。唯有这些,才能缓冲他那长期被遗弃、被歧视、被认作低人一等的压抑心理和现实。但正像他的出于自卑的自尊一样,这种抗争、背离和仇视是一种扭曲的、压抑的发泄,是出于报复式的自戮!以后“清华四子”的分手,甚至朱湘生命的悲剧皆源于此。

因此,可以说,“桃梨之争”背后除了翻译观的差异之外,还是意气之争,是关系密切又有相似的孤傲、清高、暴烈气质的朱湘、饶孟侃对徐志摩、胡适等的生活方式与诗歌观念不满的发泄。

参考文献:

- [1]王宗璠.与王剑三谈译诗的通信[N].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5-02-25(4).
- [2]王剑三.与王宗璠谈译诗的通信[N].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5-02-25(4).
- [3]饶孟侃.春风吹又生[M]//饶孟侃.饶孟侃诗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 [4]朱湘.布朗宁的“异域乡思”与英诗[C].朱湘.朱湘作

品集[DB/OL].[2011-02-15].<http://www.doc88.com/p-7030455194.html>,279,285,280,284,283.

- [5]王宗璠.读了“布朗宁的‘异域乡思’与英诗”后[N].晨报副刊,1925-3-15(5-6).

- [6]xmd19.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DB/OL].[2011-02-16].<http://www.xici.net/d23649314.htm>.

ber/index.html)2007.

- [2]张建新,董云川.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云南大学个案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125.
- [3]陈晓浪.和谐文化建设背景下高校精神文化的构建[J].教育研究,2008(10):181-183.
- [4]李有亮.大学精神的缺失与重建[J].国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动态,2010(1):9-9.
- [5]肖谦.论大学文化与学风建设[J].当代教育论坛宏观

教育,2007(11):55-56.

- [6]韩延明.强化大学文化育人功[J].国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动态,2010(5):4-4.
- [7]王梦恕.军魂永驻,自强不息,求实创新,知行合一——祝贺石家庄铁道大学建校60周年[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彩一.
- [8]王雪军.浅析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及优化[J].高等教育研究,2005(3):73-74.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Spirit Culture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ersonnel Education

——A Case of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ZHAO Yan-bin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Party Committee,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university spirit is the core element of university culture. It is the collective value orien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pursuit developed in the long process of university history.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force, the culture of university spir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strong appealing, rallying and cohering force. It has an irreplaceable and imperceptible effect on personnel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Taking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notations, features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university spirit culture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ulture of university spirit; cultivation; personnel educatio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杨继成)

(上接第64页)

- [7]朱湘.一封致友人饶孟侃的公开信[C].朱湘.朱湘作品集[DB/OL]. [2011-02-15]. <http://www.doc88.com/p-7030455194.html>.
- [8]饶孟侃.附志[N].京报副刊,1925-3-28(5).
- [9]饶孟侃.“野火烧不尽”——告《盲目的读者》[N].京报副刊,1925-3-28(6).
- [10]朱湘.《尝试集》[C].朱湘.朱湘作品集[DB/OL]. [2011-02-

17]. <http://www.doc88.com/p-7030455194.html>, 142-145.

- [11]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C].朱湘.朱湘作品集[DB/OL]. [2011-02-17]. <http://www.doc88.com/p-7030455194.html>, 126.
- [12]朱湘.翡冷翠的一夜[C].朱湘.朱湘作品集[DB/OL]. [2011-02-17]. <http://www.doc88.com/p-7030455194.html>.

Peach-or-pear Dispute: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Emotions

GENG Bao-q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The Peach-or-pear dispute among Zhu Xiang, Rao Mengkan and Wang Zongfan i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original-centered theory and the reader-centered theory, which serves as a typical example for the research 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especially the translation of poems. Meanwhile, the dispute illustrates the protest against, deviation from and hate of the age and society of Zhu Xiang, who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prejudiced and regarded inferior but longed to be recognized.

Key words: peach-or-pear dispute; translation theory; impulse; Zhu Xiang; Rao Mengkan; Wang Zongfan